

September 2020

Xu Zhongy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uzhuo Ji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Jiang, Shuzhuo. 2020. "Xu Zhongy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 (5): pp.1-1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5/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

蒋述卓

摘要: 本文论述了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领域的多方面贡献。他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科班出身,百余岁人生中八十多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他怀着报国之心,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树立了敢闯学术禁区、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学术典范;他有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兼收并蓄的学术方法,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在古代文艺规律和创作经验、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与表达方式、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以及重视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功夫诸方面都取得杰出的成绩,积累下丰富深厚的学术经验。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指导、提携年轻学人上所花的精力与心血也是有口皆碑的。

关键词: 徐中玉; 古代文艺理论研究; 学术精神; 学术经验; 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蒋述卓,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研究。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中文系第二文科楼 811,510632。电子邮箱: tjzs@jnu.edu.cn。

Title: Xu Zhongyu'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Xu Zhongyu's vari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s a professional in this field, he devoted to it more than 80 years of his life. As a patriot, Xu Zhongyu,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ok the initiative to emancipate his mind, and became an exemplary explorer who dared to enter the academic forbidden area, to innovate and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Xu Zhongyu was open-minded in terms of academic vision and eclectic in his research approach. With his singular academic vision, he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and accumulated rich and profound academic experience. In addition, Xu Zhongyu was renowne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ociety, as well as his efforts to guide and support young scholars.

Keywords: Xu Zhongyu;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academic spirit; academic experienc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uthor: Jiang Shuzhuo,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Room 811, Second Liberal Arts Building, Ji'nan University, 601 West Huangpu Dadao,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tjzs@jnu.edu.cn

徐中玉(1915—2019年),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教育家,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并长期担任《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主编以及全国高校文艺理论学会(后改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发行量甚大、影响甚广的高等学校教材《大学语文》的主编。他一生潜心学术与写作,从大学三年级起就开始搜集整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百余岁人生之中近八十年都在研究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等身,其学术与理论贡献卓著,彪炳史册。

本文在徐中玉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他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学术经验与重大贡献,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他一生为国、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学习他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上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兼收并蓄的学术方法和丰富深厚的学术经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

翻开《徐中玉文集》(共六卷),我们不难发现,1978年至1985年是他发表文章最多的时期,尤其又以1979年与1981年为最多,而且每篇都充满着激情与活力。这一方面得益于他长期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得益于时代——改革开放的激荡。从1957年到1976年,因为政治的原因,他被剥夺写作与发表的权利20年。1978年他才完全平反昭雪,摘掉“右派”的帽子,63岁才重新担任校内外教学行政的各种职务,并恢复研究,提笔写作。那时的他,“哪怕仅有一点微薄的绵力也愿完全用出来再做点事情,证明文化专制主义是多么荒谬、野蛮”(徐中玉,《徐中玉自选集》2)。

正是出于这种报国愿望和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痛恨,徐中玉为呼唤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和创作自由大声疾呼,并首先在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树立起敢为人先、勇闯学术禁区的榜样。1979年他发表的古代文论研究文章就有《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文章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原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论“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和《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与形象思维问题》(原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形象思维问题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等。

在《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一文里,他从周恩来1960年强调的“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入手,根据中国古代文论中

大量论述文艺创作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的“出入”理论,揭示了古人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比如,古人强调在“入”时对他的描写对象尽量做到冷静、客观、全面的观察,以便更真实、深刻地去反映它的本质和价值。“观察得越全面、越深刻,就越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越能正确、深刻地评量它,具体、生动地描写它。”(《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845)就是在“出”了之后也可以静观细察,“‘入’时感情容易激动,注意往往片面,不能全面、历史地分析、研究问题,不易达到艺术真实,不能认识事物深处。真处深处,其实也就是高处”(849)。因此,古人对文艺创作是不主张求之过急的,即杜甫所言“能事不受相促迫”(“戏题画山水图歌”2001)。徐中玉写此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对“四人帮”的不按艺术生产规律办事,搞图解政策,用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要求作家并塞给读者。他在文章结尾时总结道:“文艺创作既然要求‘入乎其内’,又要求‘出乎其外’,入、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火候未到,强作必然不好,因此从作家方面说,他应该享有‘能事不受相促迫’的自由和权利,从领导艺术生产方面说,则应该尊重作家这种自由和权利。”(855)联系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读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看,两文应该算是异曲同工,它们正是提倡艺术民主的姊妹篇。《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是从正面直接言说,《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则是借古代文论来进一步深化。在《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里,他直接批判“四人帮”不尊重艺术民主,不按艺术生产规律办事,搞文化专制主义,“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一段时期里,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竟使人们厌烦得连收音机都不愿打开。文艺界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创作怎么能不萧条、冷落”(《徐中玉文集》第五卷 1561—562)。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人们将越来越明白,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最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无疑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1572)即使在这篇直接言说的文章里,他也引用了不少古代文学艺术史的材料,如孔子、曹植、戴逵、周昉、李世民、韩愈、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言论作为佐证。他对艺术

民主与创作自由的提倡,还一直延续到1985年,在《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里,他更是为1984年12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给大会的祝词中的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称赞叫好,说它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宣布。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的思想观念,徐中玉这时写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震撼力的文章,如《文章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论“辞达”——古代文化中的性情描写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严羽诗论的进步性》(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论陆机〈文赋〉的进步性及其主要贡献》(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等等。

《文章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一文,虽然是从鼓励与指导青年人创作“必须放”的角度出发的,但里面通过引用一系列古代文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对梁代萧纲文学思想的正名,肯定了文学吟咏情性的特殊规律,提出青年人的创作应破除迷信、冲破束缚,以豪放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放胆而为。“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敢于开动机器,敢于幻想,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敢于前进。”(《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709)在评价萧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文学观念时,他引用《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南齐书》以及杜甫、苏轼等对“放荡”的用法与理解,证明萧纲所说的“放荡”“都没有放纵情欲,迹涉淫秽的坏意”(659)。联系萧纲在文学上的其他说法,他“主张文艺创作要‘吟咏情性’,‘操笔写志’,要‘吐言天拔,出于自然’”(696)。徐中玉指出: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论“一不是主张色情文学,二乃针对当时流行文学的弊端而发,三能注意到文学应用比兴方法吟咏情性的特殊规律,实在是可以开拓思路的主张”(697)。查一查在徐中玉之前对萧纲“放荡”论的正面评价,只有朱东润在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一句正面的说法,称赞萧纲“此种见地,真近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致也”(朱东润 64),但朱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发挥。在1949年至1979年以前

其他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将其视为六朝色情文学理论的代表。而徐中玉在1979年思想解放历程刚刚起步的阶段就有如此放胆的言论,实在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种敢于突破思想禁区、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关于徐中玉对“文章且须放荡”的评价,古代美学与古代文论研究的著名专家张文勋在1982年时认为,徐中玉的“分析是中肯的,有说服力的”,“它充分说明六朝文艺思想是很解放的。而这种思想的出现,很显然又是和当时蔑视礼法,追求超脱,放浪形骸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张文勋 167)。在徐中玉此文之后,1984年有赵昌平的《“文章且须放荡”辨》发表在徐中玉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上。赵昌平的文章除了考证从《汉书》至齐所说的“放荡”,均非关淫佚浮荡,至唐犹然,就是“不拘礼法,豪逸不羁之义”。在此文中他还论述道:萧纲虽为梁陈宫体诗的鼻祖,但其文论“初意并非专在提倡‘轻艳’‘淫靡’文风”,“而要在文章代谢,不拘成法,以美文更自由地抒写性情”(赵昌平 93—95)。谈蓓芳在《上海文论》1985年第5期《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的文章里,也在肯定萧纲、萧绎的文学地位时,认为萧纲的“放荡”论是“放任情感”之意,是要求文学纯粹以作家自己的感情为依归,反对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束缚。再后来更有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尤其是抒情特性的角度,肯定了萧纲的“放荡”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是“主张情感的解放”,是“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进展”(章培恒 骆玉明 480)。而这些成果的出现,与徐中玉在1979年的放胆之言与开创之功都有关系。

《论“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是徐中玉针对“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上的《略论〈文心雕龙〉》否定孔子与刘勰关于“辞达”是“抹煞了文艺的特征”的言论而写的文章。在此文里,徐中玉不仅用翔实的资料证明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并不是抹煞文艺的特征,还指出了刘勰对孔子“辞达”的认可是“在于它们的‘衔华而佩实’,而不是一味的直质”(《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859)。他还具体对古代

文论中的“辞达”“达”些什么、应怎样“达”以及“辞达”应具备什么条件等等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从孔丘提出‘辞、达而已矣’以来，经过后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经验的积累，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挥，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艺术表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理想。”（869）所以，把“辞达”视为抹煞了文艺的特征完全是错误的，是一种倒退。《“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文指出了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是“一种非常光辉的思想”（928）。他提出的作文要“有意而言”包含着“救时”和“济世”的内容，同时指出“‘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931）。“我们今天要写真实，文学创作既要干预生活，揭示社会的病态，决不能再搞瞒和骗，同时亦绝不能为揭露而揭露，使读者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以致产生不良的客观效果。”（934）徐中玉的这些观点，饱含着一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对文学的真诚热爱，他希望文学对国家的发展与前途能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心情和对文学的态度与他在上海的两位好友王元化与钱谷融是同气相求的，我的老师王元化主张文学是“向着真实”，钱谷融则是“文学是入学”的坚持者。在关于文学的功用和目的的阐述上，徐中玉在1981年和1983年分别又发表了《论杜牧的文学思想》和《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文须有益于天下——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年》的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他对杜牧写诗作文的目的和忧国忧民经邦济世的思想、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和要有“救民于水火之心”的文学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正是在对“文须有益于天下”这一点的认识与论述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徐中玉在接近70岁时（1984年）还从民主党派民盟成员的身份出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对于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徐中玉极其痛恨并以拨乱反正的学术勇气给予纠偏，对一些敏感的有争议的人物和理论命题赋予新的评价。《严羽诗论的进步性》对1949年以来将严羽视为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甚至脱离理性，是唯心主义、复古主义的落后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驳斥，并提出严羽提出的诗应吟咏情性就是主张诗首先应该有真情实感，是把内容放在主导地位的，并非

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他紧紧抓住诗的艺术特征——妙悟展开阐述，是针对江西诗派末流和四灵派轻纤雕琢以及江湖派粗率滑易的并不健康的诗风而发的，是要求回到吟咏情性的正路上来。他推崇盛唐，虽也欣赏王、孟一路，但基本倾向是推重李、杜，他还推重建安风骨，这是反对晚唐诗的缺乏风骨，并非复古主义。因此，他认为：“指责严羽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理性，完全陷入唯心主义、复古主义云云，不符合事实。”（《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881）后来，他在给古代文论研究学者陈定玉所作的《严羽集校》写序时，对当时《辞海》中的“严羽”条和“沧浪诗话”条又进行了批评与纠正，指出严羽“针对当时许多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以及种种形式主义的弊端，总结过去经验，提出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旗帜鲜明，坚决捍卫诗歌的艺术规律，所主张的基本是合理的”。“他的《沧浪诗话》确实是一部有系统、有特色、有勇气、有很多科学价值的大作。”（《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304）在《论陆机〈文赋〉的进步性及其主要贡献》里，徐中玉针对以前否定论者认为《文赋》是形式主义理论的创始者、有些论点带神秘意义、陷入不可知论、天才中心论等等进行了辩护，认为它讲究形式、重视形式，绝不就等于形式主义，它也没有重形式轻内容，“而是在强调内容，承认内容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来讲究和重视形式的”（《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884）。它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看法、对纯文学特点的理解、对创作中形象刻画与传达精妙性的陈述以及对作家修养的认识都是有启发性的，是进步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有贡献的。

二

徐中玉1934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叶石荪指导他从习作小说转到文学研究并重在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探索，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内迁并校到重庆的中央大学。1939年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毕业，他去云南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专治古代文论尤其是宋代诗论。当时他的指导教师有冯沅君、陆侃如、康白情、李笠、穆木天，校部还给他聘请了郭绍虞、朱东润作他的校外导师。在研究院的两年，他积累了上万张的资料卡片，还要完成三十万字的硕士论

文。^②可以说他是正宗的古代文论的科班出身,而且出自名门。我们现在看他 1936 年至 1945 年之间有关古代文论的八篇论文,不仅有扎实的学术功力,着力去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往往能独辟蹊径,有着独特的学术眼光。如《论诗话之起源》通过多方文献考证,认定钟嵘的《诗品》乃是诗话的始祖,“此说既无起源于古代著作说之渺茫无稽,亦无起源于宋说之近视与狭隘”(《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134)。在《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传播的影响》(此文实际上是他抗战时期的著作《中国文艺批评》第十二章、十三章所论的内容)中,他进一步考证指出,六朝时题名“品”“评”之类的著作与佛家经论的篇章“品”大有关系。不仅如此,中国文艺批评中题名“格”“例”“句”“图”“话”之类的著作都是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他还就佛教思想对中国文艺批评的影响作了五大方面的阐述(1135—1157)。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充分注意到佛教传播对中国文学批评影响的,除了罗根泽之外,就是徐中玉了。他于 1942 年写的《南朝何以为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发展时期》一文,全面论述了南朝文艺批评的发展盛况、发展的原因、发展的社会基础等,在指出发展的原因方面,他从文艺自身的原因(文体的新变、总集的成立、创作的发达)、社会环境的原因(君主好文、文艺独立价值已经固定、讲论风盛)两端进行分析,认为南朝文艺批评的发展实由这“两方面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而造成”(1101)。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如果论南朝文艺批评的发展原因大致都未超过徐中玉此文所论的范围。至于《〈文心雕龙〉与〈诗品〉》一文,徐中玉论述了《文心雕龙》的情采论、风格论、灵感论、通变论、鉴赏与批评论,指出“《文心雕龙》这部书,条例分明,目光远大,包罗丰富,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他的思想,从他这部书里可以明显看出曾受儒、道、佛三家的影响”(1123)。这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是极富开创与启发的意义。上世纪 80 年代后《文心雕龙》研究成为显学,是不能绕过徐中玉的这篇文章的。对于钟嵘的《诗品》,徐中玉也论述了《诗品》的性情为本说,反对用典与拘牵声律说以及溯说流别的作家批评方法论,这也是看得非常准确的。他还总体上论述了刘勰与钟嵘的地位,说“我们必须认清,南朝创作界虽颓废,批评界的两位卓绝人物却未

赞成这种风气,不但没有赞成,而且还成了反对和改进这种风气的先锋”(1129),并指出他们有历史的眼光,历史使他们备晓了“古人之大体”,所以能彻知当代、预见未来。这是站位很高、视野宏阔的评价。

从 1979 年始,徐中玉的注意力实际上就已经转到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和创作经验的研究上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贡献是独树一帜而且卓著的。

1979 年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界热点的形象思维问题讨论,但他的文章《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与形象思维问题》(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形象思维问题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后收入他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却是专门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来谈的,而且谈出了九大问题,涉及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的各个方面,从艺术构思到艺术表达,从形象思维的主要内容到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作家才能到生活经验的获取等等,资料极其丰厚,看问题深刻而准确,观点非常到位,真可谓阅书广,境界大,取精宏,立意远,在当时讨论形象思维问题的论文中也是别开生面的。^③

1981 年他发表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之一》(原文载《文学评论丛刊》第 13 辑《古典文学专号》,后收入他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他从古代文艺创作写诗作文中的“要道”谈起,论到作文要先忘却习气,才能获得善术,视野开阔了,便能“移情”,真正改弦易辙,因此创作就要高度重视入门,以免走弯路,这便要重视如刘勰提到的“功在初化”和严羽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也便是端正方向路线。他指出:“‘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一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对我们今天仍很有用。我们的‘正’是什么?‘高’在哪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谈‘正’谈‘高’,当然都离不开这根本的两条。”(《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686)他的这种意见带有很鲜明的时代印迹,与“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意义相合,不能不说是古代文论研究“古为今用”的典范。这一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苏轼的创作经验》,此书将他在 1980 年 1 月至 1981 年 9 月在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论苏轼创作经验的文章集中起来出版,“研究苏轼的创作经验,鄙意还在揭示其中合乎科学、用之有效、具有规律性的部分,

期望它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所帮助”(927)。书中的篇章涉及苏轼的创作目的论、随物赋形与文理自然以及形神兼备的美学思想、美“可以数取”而不能“求精于数外”的创作奥秘、胸有成竹和技道两进的艺术规律、自成一家的独创理论、“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的批评鉴赏论等等,每篇文章虽然都不长,但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揭示却非常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他之所以研究苏轼,是因为“苏轼在若干极短文字中若不经意谈到了诗、文、书、画创作中的经验教训,读之有味,思之精深,耐得不断挖掘,关键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突出的创作才能,而且还能深入底里,点出精髓”(《徐中玉文集》第一卷 11)。这也是我理解的后来上海市要请他出山担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的重要原因吧。1985年他又将他的古代文论研究专著命名为《古代文艺创作论集》^④,其研究的着眼点还在于对古代文艺创作经验与创作规律的揭示。还必须说到的是,在经典作家专书的研究中,有关苏轼的创作目的论是很少有人涉及的,唯一的论述就见于徐中玉的文章内。

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的重视与研究,是又一研究特色和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研究是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讨论开始的。起初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展开,而体现到古代文论研究中则是如何挖掘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论原则,看从中是否可以提取有用的理论为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服务。随着对古代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开展,对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当时就此发表文章的有杨明照、牟世金、蒋树勇、陈伯海、张少康等。^⑤1983年6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三次年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探讨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以及如何开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问题。而这次议题的提出,是徐中玉在1982年10月30日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919)。1985年他在《简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中谈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四个特点:尚用、求真、重情、重简。因为此文是为纪念《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写的,篇幅有限,他在

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方面讲得比较多,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充分展开,只是在第四点“重简”的论述中涉及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文论的理论思维方式究竟是不是薄弱的问题。他指出,有的人拿黑格尔的大部头著作与中国文艺理论相比,断言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薄弱,对这种脱离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习惯等等要素的比较是无法苟同的。他认为“薄弱或不薄弱,不能看外表形式,主要应该看探索的深广度,理论发挥出的力量,对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起了多么大的实际作用”,“‘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才两万多字,却已史论评相结合,成为不朽名作。难道它理论不深,分析不精,没有体系?韩、柳、欧、苏,都无理论批评专书(《六一诗话》远不如欧公集中诸文重要),卓绝之论岂少?难道不成系统?诗话、词话,虽零碎而作用甚广,娓娓道来,亲切有味者不少,何尝不如堆砌名词概念、生造字句动辄数十万言之作”(《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190—191)。他在给华东师大中文系齐森华教授《曲论探胜》一书作序时,就齐森华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及其特点的研究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研究“大可为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张目”,并提出“世界文明史表明,每个民族的思维方法和表达理论的习惯,都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各民族的特点都还是可贵的。它会随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彼此逐渐接近起来,根本不必强分轩輊,勉强改造”(“《曲论探胜》序”2—3),并对长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自己的文论不同程度的妄自菲薄进行了批评与分析。1989年他又于《略谈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对什么是民族特色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所谓民族特色,我认为,不是指其他民族一定没有的东西。读天下书未遍,动辄就断言这是其他民族一定没有的东西,我往往怀疑好用这样口气说话的人是否知道这个地球上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多少议论。所以我自己一向只把民族特色这种东西,只看成在我们民族的文论里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具有本民族特有表现方式,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东西”(《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196)。1985年,他的《简论中国文论民族特色》文章指出中国文论有四点民族特色而在此文里他又补充了两点,即形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和异常丰富的艺术辩证法。这实际上已经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进

一步探索到了它的思维方式。到1991年,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其当代趋向》,陈述了中国古代文论思维的四大特点: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描述的简要性,这便将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特点融合在一起来研究了。

纵观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的研究,既有着强烈的中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又有着豁达的胸怀和世界眼光,他既不贬低西方的文论而抬高自己,也不允许强分轩轻,妄自尊薄,他主张的是“同之与异,不屑古今”,也“不屑中外”,“取精用宏,兼收并蓄,集大成而共求进步”(《徐中玉文集》第四卷1210)。在《徐中玉文论自选集》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其当代趋向》这一文章的后面他还专门作了附注,再次表达“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各有所长,可以相融互补”,并指出如果轻视自己的文论,说它是“缺乏系统,比较零碎,分析不细,甚至扬西抑中,妄分高下。其实颇似言必称希腊罗马,而对传统文化的优点,所知太少,非通人之论”(《徐中玉文论》136)。徐中玉所作的就是通人之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总序里,他还就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中国人不是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也不是没有人做过,但一般人不愿意、不习惯,甚至还有认为这样做不合适的。“即使在讨论问题、抒发己见的时候,文论家们总仍恪守文艺规律:有感而发,不得已而言,精语破的,点到为止,使人自悟并得以举一反三,而且始终仍保持着具体、感性、描绘、比喻、想象、意在言外等文艺色彩,有理有趣,举重若轻,愉人悦己。[……]当我们把它同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进行了比较之后,就越发觉它至少可以同西方文化成果并立而比美,对人类文明发展起了同样巨大的作用。”(《徐中玉文集》第五卷1398)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比较视野是非常开阔而有见地的,自然,这种视野也体现在他提倡的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里了。

三

徐中玉在回忆他1939年于云南的中山大学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的生活时说到,那时他在云南澄江城外一座小山腰的斗母阁里,一灯如豆,伴着山野呼呼的风声做资料。在研究院的两年中,他积累了成万张的卡片。在1957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间,他从七百多种有关书籍中做了四五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多万字。我去徐中玉家中的时候,总把目光投向那摆放在走廊的卡片箱,觉得那就是百宝箱。徐中玉做学术研究,最基本也最基础的功夫就是依靠资料,重视文献,一切从材料出发,论从文献出,论从史出。他的文章引用例证丰富,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常常引用多种文献加以证明,层层推进,显得扎实而很少“花功夫”“花棒”,行文之老道颇有钱钟书的笔法与意味。比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之一》,他先从《水浒传》中的王教头如何从新点拨史进的故事说起,引出学艺一定要追求实效,不能只图“花棒”好看。继而再引曹丕《典论·自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及唐代“花琵琶”的故事说明应捐弃故伎更要道。后面所引多种文献如苏洵学文尽烧旧文、张戒谈学诗要除去苏黄习气始可以论唐人诗,严羽论学诗当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等等,将一个学习文艺创作必须重视入门的初化阶段,不要学“花功夫”,避免走弯路的古代创作经验说得十分透彻。钱钟书的《管锥编》在东西方的资料梳理中理出不少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规律,徐中玉的文章专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理论的资料中大做文章,同样都是大师手法。我进入华东师大做博士生时,恰逢徐中玉带领团队在做《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的工作,我也中途加入,承担了其中的《文气编》的工作,接手时,徐中玉将积下这个专题的不少卡片悉数转给了我。此套丛书从上世纪90年代出版起,陆陆续续出版了二十册,可谓硕果累累。此套书在2015年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中获得了二等奖,三十余年的努力终成正果,没有徐中玉的牵头与组织是做不到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套书里,徐中玉还承担了《通变》与《艺术辩证法》两编。

做资料、重文献是徐中玉的基本功夫,也是他的基本研究方法。然而,徐中玉绝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绝活,相反,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兼收并蓄,向外国学习,提倡比较,提倡跨学科,更是方法论

改革的倡导者和推进者。

早在1980年他在研究苏轼的创作经验时就涉及了苏轼的跨界方法,他于《妙算毫厘得天契》一文里,研究到了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苏轼认为艺事之美需要“妙算毫厘”“得自然之数”,从艺者不可草率,“一以意造”,全凭主观设想,不作精微观察以至仔细的计算。“能者即数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美虽“可以数取”,但创作不能“求精于数外”。他指出,“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启发”,“他把文艺理论同数学密切结合了起来,表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本来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反之,文论研究者必须放宽眼界,看到各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进一步打开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奥秘”(《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977)。这是他最早提到的学科融通意识。1982年10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邀请了王元化、周振甫、徐中玉等发言,徐中玉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就是针对有人提出的能不能用中国古代文论系统来写一本文学概论问题发表意见,他说,如果写这样一本书,那倒是很有特点的,“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往往是搞古代文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现代的东西不大注意”,“而研究现代理论的,研究西方文论的,或者是马列文论的,对古代的东西也不清楚”,“这三个摊子好像是缺乏一个桥梁来沟通”,“这与建立马列主义民族化文艺理论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沟通问题”(918—19)。他的这个发言后来以《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来》为题发表在1983年《文史哲》第1期上。而王元化也在1983年《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发表了《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后来还作为《〈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的跋收入该书中,他提倡的古代文论研究要做到“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意见成为当时代表性的观点,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当时也被视为用中西诗学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开创性著作。徐中玉“三个方面沟通”的观点与他的老朋友王元化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是眼界开阔、识见甚高的言论。

从1984年11月开始,文艺理论界关于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拉开序幕,《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等争相发表文章,1985年方法论的讨论就成为了焦点,以致这一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初,徐中玉开始编辑《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内中收录了王元化、蒋孔阳、郭绍虞、杨明照、吴调公、王文生、张文勋、陈伯海、张少康、胡经之、郑朝宗、张隆溪、南帆、陆海明等人的文章以及徐中玉自己关于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几篇札记,同时收入的还有国外文论家吉布斯的一篇译文,是从阿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章。作为编者,徐中玉对此书作了编后小记,在“小记”里徐中玉写道,当前科学空前发展,许多边缘学科纷纷突起,对古代文论学科来说,与其他学科研究一样,“挑战已经掀起,成为热潮,除非安于落后,以抱残守阙自喜,应战才是勇者应走的道路”。“应战的道路自然不止一条,改革研究方法当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诚然,方法不等于目的,但方法改对了,改革的目的就容易达到。”而对于方法,“只要行之有效,符合科学,能深广地说明问题,传统的和外来的方法都应该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改革决不意味着完全丢掉传统,也不能全盘西化。把传统中的好东西同外来方法中合理的东西在现实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起来,我相信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就能逐渐改变面貌,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193—194)。《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对古代文论界具有引导性的作用。徐中玉对改革方法论的高度敏感,充分体现出了一种改革意识和对学科发展的战略意识。1985年7月31日到8月5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吉林长春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同时提出要重视比较方法和对新方法论的关注。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杨明照会长和徐中玉副会长。会后,徐中玉亲自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对于新方法论的讨论作了概括,认为它至少有三点收获:一是明确了文艺理论研究方法改革和多样性的必要性、重要性,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如何实现方法的改革和多样性,三是关于新方法的实际运用。同时他在综述中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我们对过去实践已经证明是真理、是规律的东西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它不是新东

西就加以轻视、厌弃。同时我们对一切新东西,即使它还不很完善,或者在运用上还不甚具体妥帖,也不要根本怀疑、反感甚至排斥,而是需要仔细加以了解、分析,千万不要深闭固拒,像过去那样,对我们还不知道、不理解、不习惯的东西轻率地断定为异端邪说,而一律加以抛弃。”(《徐中玉文集》第五卷 1540)当然,他也呼吁要对新方法运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比如感到艰涩、抽象、比较玄空、运用得还不恰当等给予理解,不要急于苛责它的不成熟、不系统、不完整,要支持这种新的探索变得更加完善起来。徐中玉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成果高度重视,也是对古代文论运用新方法的高度重视和极力推动。

关于用比较方法研究古代文论,徐中玉于1980年3月1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当时取名上海师范大学以区别于上海师院)与武汉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里就已经提到,他除了谈要重视研究古代文论的特点、重视研究古代文艺家的创作经验、重视详细占有资料等以外,专门提到了“要注意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之下,古今中外多作比较,对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1175)。当时比较文学正在复兴,1981年季羨林给王元化的信中就提到“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王元化 257)。中西比较诗学逐渐浮出水面并影响到古代文论的研究。杨明照在《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发表《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徐中玉1986年在注意文艺理论新方法编辑《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时就已收录了国外文论家吉布斯评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章,1987年,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在1987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在成都举行,这次会议认识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困惑与危机——缺乏当代性与现实感,如何将古代文论研究引向深入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会长杨明照提倡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副会长徐中玉提倡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当代文论相沟通,会议明确提出并肯定了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一直以来,徐中玉对研究方法主张兼收并蓄,

主张向外国学习,他在《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上著文谈到,中国文学研究者要尽可能多读一些外国文学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可以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主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都要学习,把各种知识都当作一个学问的整体来认识。他还对自己过去中学与大学没能在英语学习上获得效率以致现在不能较好地运用外语来认真学习外国的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表示是一大憾事(“古代文论”65—66)。后来,他在《略谈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收入《徐中玉自选集》的附记里也写道:“从事古代文论资料的搜集、研究近六十年,深感资料之丰、议论之精、对今天能起积极作用之多。愧未能多学些边缘学科知识增一点生发之力。”(《徐中玉自选集》12—13)他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闭关锁国,观念隔阂,存在语言与文字上的困难,加上某些研究者不注意文学发展的实际,“只是各自空说,极少沟通,影响到整个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严重滞后。现在社会环境有了改善,视野逐渐宽广,已开始有了融通的要求与觉醒”(《徐中玉自选集》12—13)。这些认识都充分展现了徐中玉学科发展的融通意识以及虚怀若谷、活到老学到老的进取精神。

自然,徐中玉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对新方法的吸纳,又是与他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分不开的。他在多篇文章里都呼吁研究古代文论要古为今用,如《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来》以及《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后记等等,他研究古代文艺中的创作经验也着眼于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借鉴,他说过:“我们应该从古文论里边,把前人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是加以整理,或者是加以发挥,同现在的问题结合起来,通过规律性的研究,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来古为今用,这才是个根本性的东西。”(《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919)方法不等于目的,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新方法的吸纳一定会促使研究目的的更好达到。徐中玉对新方法的态度与他研究的整体意识、当代意识以及全球视野是紧紧关联的。

四

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是杰出的学

者,起到了学术表率 and 领头羊的作用,贡献卓越,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工作中也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为学会的组织与日常工作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推动全国的古代文论研究做出的成绩令人称许与赞叹,被视为全国古代文论界的主帅。

1979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昆明温泉宾馆举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及教材编委会”,会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提议,经过酝酿,最后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周扬为名誉会长,郭绍虞任会长。徐中玉就是当时23名理事会的理事成员之一。1983年6月4日至10日学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年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杨明照、徐中玉任副会长,徐中玉同时兼任秘书长,秘书处随之转到华东师大,秘书长一职一直到1989年的第六次年会才转给华东师大的陈谦豫,徐中玉同时还担任会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的主编。1987年10月,学会在成都举行第五次年会,成立第三届理事会,杨明照任会长,徐中玉与王运熙任副会长。1993年7月学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第八次年会,徐中玉担任常务副会长,直到1999年在河北保定举行第十次年会才卸任担任名誉会长。实际上,由于杨明照会长年事已高,从1991年到1999年学会召开年会都是由徐中玉主持。1999年之后他依然担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的主编工作,但加上了1999年学会换届新担任学会会长的郭豫适担任双主编,编委中的胡晓明(也是学会的秘书长)兼任执行编务,他的工作量才有所减少。此时,他已经84岁。

徐中玉还为古代文论领域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努力和贡献。1980年,受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和武汉大学在上海共同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助教培训班,主事人就是徐中玉和王文生。这个培训班为全国高校培养出一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师资力量,在这个班上学习过的很多人以后成为了各大学从事古代文论教学与研究的骨干。他在华东师大指导出来的硕士生,后来也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优秀人物,如南帆,硕士论文写的是古代文论,但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翘楚;陆晓光,硕士毕业后跟随王元化读博士,也一直从事古代文论的研究,他主持翻译出版的《冈村繁文集》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还有吴炫、蒋树勇、

张建永、谭运长等等,都是文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才。徐中玉对文艺理论界年轻学人的帮助与提携,付出的心血有口皆碑,除了在《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编发他们的文章以外,还在每次的学会年会上鼓励与指导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努力创新。我的硕士论文当中的一章《〈原诗〉的诗的主体论》投稿给他,就是经他指导修改,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一辑上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中国历代文论选》14)徐中玉的道德文章与学术精神彪炳于后世,薪火相传,必将对日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到无穷的作用。

注释[Notes]

① 具体参见徐中玉:“代序:忧患深深80年——我与中国20世纪”,《徐中玉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该文也收入《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置于第一篇,可以视为整套文集的总序。

② 具体参见徐中玉:“学习文艺理论研究的一点体会”,《徐中玉文集》(第五卷),第1396—397页;“求学过程中的三点粗浅体会”,《徐中玉文集》(第六卷),第1919—924页以及《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70—80页。

③ 当时古代文论界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有张少康:“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1979):54—63;王达津:“古代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0—103页;章培恒:“从李贺诗歌看形象思维”,《文汇报》1978年7月21日第3版;王文生:“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志商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1979):29—34;章培恒:“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复旦学报》4(1979):49—56;等等。

④ 徐中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后来此书的前半部分篇章收入《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⑤ 当时讨论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文章有:杨明照:“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页;牟世金:“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学术研究》4(1983):116—24;蒋树勇:“论‘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初探”,《文艺理论研究》4(1983):122—29;陈

伯海:“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文学评论》3(1984): 95—102;张少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1986): 133—40;等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曹丕:“典论·论文”,《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4。

[Cao, Pi. “On Classics; Essay on Literature.” *Selected Literary Theorie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ds. Yu Yuan and Zhang Mingg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14.]

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杜甫全集校注》第四册,萧涤非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2001。

[Du, Fu. “Lines Playfully Written on a Landscape Painting.” *Complete Works of Du Fu with Annotations*. Vol. 4. Ed. Xiao Dife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2001.]

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社会科学战线》4(1986): 257。

[Wang, Yuanhua. “On the ‘Three Combinations’ of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Front* 4 (1986): 257.]

徐中玉:《徐中玉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Xu, Zhongyu. *Collected Works of Xu Zhongyu*.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曲论探胜》序”,《曲论探胜》,齐森华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6。

[---. Preface.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re*. By Qi Senhua.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

——:“古代文论研究方法札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48—69。

[---. “Research Method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Coll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d.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Qilu Press, 1986. 48-69.]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 *Selected Works of Xu Zhongyu's Literary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徐中玉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 *Self-Selected Works of Xu Zhongyu*.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1999.]

张文勋:“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张文勋文集》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57—71。

[Zhang, Wenxun.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ix Dynasties.”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Wenxun*. Vol. 1.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7-71.]

赵昌平:“‘文章且须放荡’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2—98。

[Zhao, Changping. “An Analysis of the Idea ‘Articles Should Be Dissolute’.”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Studies on Ancient Literature*. Vol. 9.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4. 92-98.]

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Zhang, Peiheng, and Luo Yum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Zhu, Dongru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责任编辑:程华平)